

研究反右運動的材料寶庫

● 徐友漁



宋永毅主編：《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10）。

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1966-1976）》（2002）之後，由宋永毅、丁抒等海內外學者編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的《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光盤版，以下簡稱《反右數據庫》）前不久面世，這是當代中國研究的一件大事，是有關研究者、讀者和所有關心當代中國政治的人的福音。

由毛澤東在1957年發動的所謂「反右運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

史上最大規模的專門針對知識份子的政治運動。這場運動以最高領導人言而無信、出爾反爾為特徵，以徹底摧毀知識份子的批評意見、地位、尊嚴和意志為後果，對於固定中國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的基調，形成中國人的思維和精神風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於中共中央在1980年代初重新評價反右運動時定下「改正大多數、堅持大方向正確」的方針，使得這場運動的起因、性質等成為長期爭論的話題。總之，還原和探討這場運動的真相，既是歷史研究者無法迴避的任務，也是關心這段歷史的讀者的興趣之所在。《反右數據庫》為一切想了解、研究這場運動的人提供了最全面、最可靠、最方便使用的資料。

儘管存在限制和壓制，但與文化大革命不同，關於反右運動的書籍和資料，人們還是有可能或多或少讀到一些。對於毛澤東的「陽謀」之說、儲安平的「黨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等等，在知識階層中大概也算得上是耳熟能詳，但對於想把事情的原委弄得一清二楚的人來說，現成的出版物是很不夠

反右運動的起因和性質成為長期爭論的話題，還原和探討這場運動的真相，是歷史研究者無法迴避的任務。《反右數據庫》為一切想了解、研究這場運動的人提供了最全面、最可靠、最方便使用的資料。

的。《反右數據庫》為進一步的了解和研究提供了必需的條件，下面是筆者在粗略瀏覽該數據庫之後的幾點評論。

一 原汁原味的材料 最寶貴

《反右數據庫》最突出的優點是內容豐富、包容量龐大，大量珍貴資料都能全文收入。比如，談到反右運動，人們都會提到，毛澤東於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與6月19日在《人民日報》上正式公布的文本〈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有很大的出入，這充分說明毛澤東為了動員鳴放，一開始說了不少好聽的、開放的話，把人們的情緒大大調動起來，而時過不久為了證明「有言在先」，卻公然把流傳全國的講話改為符合後來的說法。《反右數據庫》把兩個文本都收錄進來，讓讀者可以詳加比對。

毛在上述講話中提到：「我們在肅反工作中，也曾經並且常常把好人當作壞人去整，把本來不是反革命，懷疑他是反革命去鬥，有沒有呢？有的。從前有，現在還有。」（參見數據庫第二部分：毛澤東有關反右運動的講話、指示和文章，「毛澤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稿〕，1957.02.27」。）但在正式公布的文本中，這段話被刪去了。這是非常重大的改動，在鳴放中，批評肅反是主要意見之一，也是被打成右派的重要根據。

此外，正式文本憑空增添了講話中完全沒有的內容，其中兩段更成為反右運動的理論基礎。其一是階級鬥爭學說：

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389。下引只註頁碼。）

其二是著名的所謂「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

（一）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頁393）

毛澤東於1957年2月作〈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與6月在《人民日報》上正式公布的文本有很大的出入。《反右數據庫》把兩個文本都收錄進來，讓讀者可以詳加比對。

在講話中，毛澤東對於所謂「鬧事」持理解、寬容態度：

第一條、努力克服官僚主義，那麼人家就不罷了嘛……第二條、官僚主義沒有克服，他要鬧怎麼辦？讓鬧不讓鬧？……一個是不讓鬧，凡鬧事者就說是反革命，就說是要造反……這些鬧事者不能說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我們不會領導。讓鬧不讓鬧，我說還是讓鬧……第三條、鬧起來草率收兵好不好？又有兩種方針。剛剛鬧過兩三天，鬧事的人還沒有過癮，當局就急於想結束，這就發生矛盾，這怎麼解決？我說讓他鬧夠。（「毛澤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稿），1957.02.27。）

而在後來的正式文本中，毛的態度和之前大相逕庭：「我們是不贊成鬧事的，因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而鬧事總會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頁396）

二 前後關聯提供歷史脈絡

《反右數據庫》的編者具有歷史眼光。他們深知反右運動既有前因，也有後果，因此充分利用數據庫容量大的優勢，提供了反右運動前後與之密切相關的其他政治運動的資料，比如反右前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反右後的「紅專大辯

論」、「雙反運動」等事件和運動的原始材料，這就使我們有可能在一種歷史的脈絡中，以比較的視角深入分析、挖掘反右運動的性質、意義，以及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我們還可以參考本數據庫的姊妹篇《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1966-1976)》所提供的材料，以求得一種鳥瞰式的眼光和結論。

反右運動中最有代表性的政治訴求，應當是儲安平對於「黨天下」的抨擊，他說：「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參見數據庫第二部分：重要的右派言論和文章，1957，「儲安平在統戰部召開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發言，1957.06.01」。）

如果說像儲安平這樣的人因為其身份地位，說話還有些委婉的話，那麼其他人，尤其是青年學生就直言不諱，比如廈門大學物理系余兆升說：「黨組織和黨員侵犯了憲法規定：『國家最高權力屬於人民』。」（重要的右派言論和文章，1957，「『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言論〔一〕，1957.05.00」。）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葉蔭認為，國家「不是黨的工具，如果是黨的工具，那就乾脆黨政一體，不要國家了」。他還主張：「(1) 用條令把各級黨組織和行政部門的職責劃分開；(2) 用條令把每個人的職權固定下

《反右數據庫》的編者充分利用數據庫容量大的優勢，提供了反右運動前後與之密切相關的其他政治運動的資料，使我們在一種歷史的脈絡中，以比較的視角深入分析、挖掘反右運動的性質、意義，以及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中的作用和地位。

在二十世紀的後半葉，除了右派，其他向正統獨斷意識形態提出挑戰的人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在現存的意識形態範圍內做文章。惟有在右派的訴求(其中最具有見識、最徹底的部分)中，可以發現指向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憲政共和國的要素。

來；(3) 精簡黨委機構，把過去包辦行政部門的權力交還行政部門；(4) 黨中央和國務院今後少發或不發聯合指示。」(重要的右派言論和文章，1957，「國家不是黨的工具，1957.05.00」。)

高等教育出版社編審顧執中關於憲法得不到遵守的意見分量很重：

憲法所規定的條文，有些是有名無實，有些被破壞而沒有受到制止。例如憲法第85條規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實際許多現象不是這樣。第89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文完全被破壞了。第87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上都沒有得到保證。例如有些批評人民日報的文章，至今仍沒有被登出。(重要的右派言論和文章，1957，「『憲法有的被徹底破壞，有的有名無實』，1957.06.26」。)

在二十世紀的後半葉，能以多少成形的、整體的形式提出較為獨立的思想，自覺地或被視為向正統獨斷意識形態提出挑戰的，大概有四次，分別是：所謂「胡風集團」、所謂「右派份子」、文化大革命中的民間思想者，以及八九運動中的學生。但仔細分析之後可以看到，在這四次思想表達當中，除了右派，其他人的思想——不論以文章、建言、請願書或綱領的形式出現——基本上都是在現存的意識形態範圍內做文章。惟有在右派的訴求(當然不是全部，而是其中最具有見識、最徹底的部分)中，可以發現指向

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憲政共和國的要素。

其他三次思想運動的表達者(也包括右派中的多數)其實都可以向黨大呼冤枉。胡風所主張的，和毛澤東主張，周揚奉行的一樣，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充其量只是不那麼簡單化、粗俗和粗暴，他說了「五把刀子」、「輿論一律」的話，表面上厲害，其實不過是片言隻語，是正統之中受排擠者的怨言。文革中的大量異端思想者(遇羅克、李一哲是例外)主要想在某個方向上闡明和發揮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想把文革的理念堅持到底。八九運動中學生的訴求，一開始是要給黨內好人胡耀邦公正評價，後來主要是反腐敗、反官倒。八九民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但這主要是出於統治者的過份鎮壓、自毀政治合法性，以及這場運動剛好處於一輪世界性民主化浪潮的開端。

當然，上述三次自發、獨立思想的出現一般也包含有追求民主、正義的傾向，這構成後來者繼續追求民主與正義的激勵，但這種一般性的民主和正義訴求可能向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而真正與人類政治文明中普世價值相關，對當代中國民主運動有啟示意義的思想，僅包含在某些右派言論中。

三 右派訴求的起源、 後果和意義

右派怎麼敢表達激烈的批評意見？原因根本在於執政黨讓人們提

意見，甚至動員、強迫人們提意見。不管「陽謀」之說是否成立，以及在哪一個時間段成立，總之，人們大膽發表意見是因為當局要「引君入甕」，而不是因為人們能夠享受、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突然間令行禁止，毛澤東收放自如，也是再自然不過了。

毛澤東號召鳴放是在執政黨統治的強勢期，經濟、人心等都沒有出大問題，東歐出現的動蕩在中國不會出現；而且，毛澤東有信心預防那樣的局面。所以，反擊右派一聲令下，形勢就陡然逆變，被打成右派份子的人除了磕頭如搗蒜外，根本沒有聲辯的力量，因為大形勢完全在毛的掌控之中。

右派言論中之所以會包含一些有洞見，不受主流意識形態束縛的主張，是因為右派的頭面人物中，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人是早年留學西方的大知識份子，對於西方政治文明的理論和實踐都相當熟悉，而龍雲、陳樞銘、黃紹竑等人，1949年之前已身居高位，在政治上很有見識。學生在當時尚未處在完全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之下，有可能受到「資產階級教授」和「資產階級書籍」的影響，這與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學生形成對比，後者儘管也享受了暫時（比反右運動長得多）的解除禁錮，但自由發揮的思想不過是對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理解和闡發，由此可知反右之後的「紅專大辯論」、「階級鬥爭教育」和「反修防修教育」威力巨大、成效顯著。

非常遺憾的是，右派的觀點並沒有成為一筆啟迪後人的思想遺

產，毛澤東成功地將其作為「反面教材」來利用。1957年之後至少二十年間，大學、中學裏的班主任、輔導員、政治課教師對於那些敢提意見、關注時政、不滿現實的人一律這樣警告：「不要自以為了不起，謹防走上右派學生林希翎的道路！」當代中國政治思想發展演進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雖然一代接一代的人中總有人為追求民主、自由而進行思想探索，但完全看不到傳承的脈絡，了解和繼承的渠道被卡斷，每一代人都要重起爐灶，重頭做起，在黑暗中艱苦探索。思想的斷裂既有利於維護現存體制，也是中國未能產生大思想家和重要政治理論的原因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廣大受壓的造反派對於各級黨委的感受和當年右派差不多，但他們對於右派的態度和官方一樣，惟恐沾邊，惟恐劃不清界線，甚至攻擊對立派「組織不純，有右派」，攻擊對方的言論與右派類似。文革中有一句口號貫穿始終：「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這裏的「右派」要麼指當年的右派，要麼指對黨和現存體制不滿的人。只有極少數學生偶然讀到右派言論，產生共鳴，感到豁然開朗。

在1989年的巨大震撼之後，對於中國政治的思考和討論中浮現了一個尖銳的話題：對於執政黨合法性的考察，這既包括考察獲得政權的合法性，也包括執政的合法性。在對合法性的追問中，反右運動的性質、道德含義成為人們研究的問題，而反右運動中右派的政見、主張、觀點則成為人們進行這種研究的材料和基礎。可以期望，

在對執政黨合法性的追問中，反右運動的性質、道德含義成為人們研究的問題，而反右運動中右派的政見、主張、觀點則成為人們進行這種研究的材料和基礎。在今日中國對於憲政民主道路的探索中，當年右派的思想將提供滋養與啟示。

在今日中國對於憲政民主道路的探索中，當年右派的思想將提供滋養與啟示。

《反右數據庫》的出版是一件值得慶賀、令人鼓舞的大事。它的面世還推動了其他有關反右運動書籍

的出版——不論是正式、公開的出版還是非正式的、地下的出版。我們衷心希望，乘着這個勢頭，同仁們加緊努力，讓我們早日見到整個《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1949- 》的出版。

革命年代的重訪與超越

● 唐小兵

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已經漸行漸遠、革命者曾經標舉的理想主義氣質與批判精神愈來愈稀薄的今天，重訪革命年代如何可能？高華的《革命年代》直接地給「後革命產兒」提供了一種進入革命歷史與記憶的途徑。



高華：《革命年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革命有兩種，一種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與政治架構為基本目標，而在價值領域與社會文化領域依其自然秩序演化，比如美國革命與中

國的辛亥革命；而另一種則是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價值等領域全方位地顛覆固有的模式，而建構一種全新的、總體性的社會政治和文化世界模式，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都大體上屬於這一類。二十世紀初最早的憲政實踐失敗以後，中國社會就開始拋棄第一種模式，而迅速地擁抱總體性革命，這與林毓生所謂「以思想文化模式尋求根本解決」的思維模式形成共振（參見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希圖一勞永逸地解決傳統社會崩潰後的政治、文化與心靈秩序危機。共產主義革命屬於後一類革命。

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已經漸行漸遠、革命者曾經標舉的理想主義氣質與批判精神愈來愈稀薄的今天，重訪革命年代如何可能？高華的新著《革命年代》（引用只註頁碼）